

## 论阿契贝的政治批评与文化思想\*

秦鹏举

**【内容提要】**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就是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对于非洲文学而言，文学与政治须臾不可分离，这由其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本文论析阿契贝关于文学的种族政治批评、语言政治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从种族、语言和文化视角批驳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阿契贝的“中间”思维和文化思想启发了文化的和谐共生，有助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

**【关键词】**阿契贝；政治批评；“中间”文化

**【作者简介】**秦鹏举，文学博士，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荆州，434023）。

文学与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二者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一点，古今皆然，中外同类。文学和政治都隶属于意识形态，但文学以“审美之维”来对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残暴性。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先贤都有精彩论述和批驳，如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文明塑造“单向度人”的批评，本雅明对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无生韵的批评等。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项目编号：19ZDA29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编号：19ZDA296）、2021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小说的文化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276）、2021 年长江大学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和启蒙视域下的阿契贝小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1CSY08）的阶段性成果。

资本主义文明的残暴性,可由其殖民性鲜明地呈现出来。法依对非洲人精神“卑贱”的分析和斯皮瓦克对殖民话语“认知暴力”的阐释,则为人们揭露了殖民文化的政治权力结构。因而,不存在无政治的文学。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说:“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其所言的政治,意谓“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权力关系”。<sup>①</sup>伊格尔顿批判了非政治文学批评的误导性,认为不应该借用文学的非政治批评来掩盖文学的政治性事实,真正应该谴责的是“政治内容的性质”。

非洲文学正是政治性十分凸显的一种文学类型。在非洲,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会不关心政治。“非洲作家应该投身到当前的重大社会政治斗争中去。如果非洲作家回避非洲重大社会政治题材,无异于舍本求末,就像民间谚语所说的傻子,不去抢救着火的房屋,却去追捕火中逃出的老鼠。”<sup>②</sup>但长期以来,非洲文学的政治性却变成了西方人眼中一种存在“问题”的政治,这种问题性的质疑,包含了西方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优越感。本文以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的文学政治性为论述中心,分析其种族政治批评、语言政治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对其文化思想进行辩证阐释,并批驳西方对非洲文学政治性的质疑和否定。

## 一 种族政治批评

阿契贝对以康拉德为首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本质主义观念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了其对非洲的歪曲描写和对非洲人性的漠视。非洲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阿契贝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要颠覆帝国主义叙事,非洲人必须转变视角,从内部书写非洲。阿契贝的创作体现出对共同人性的追求,是非洲民族的寓言书写。他的创作经历了从民族自我到多元融合的过程,最终他从非洲人民那里找到了非洲文化发展的动力。

① [英]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244页。

② 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11—12页。

在阿契贝的文论《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主义》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康拉德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对于非洲人没有历史的观点，在阿契贝看来，是西方人出于一种愿望和需求，“把非洲看成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显现出来”，<sup>①</sup>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就是这种愿望和需求的典型代表。阿契贝毫不怀疑康拉德在美学上所取得的重大贡献，认为《黑暗之心》是“用英语创作的最伟大的几部短篇小说之一”。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康拉德文本所体现的种族意识形态问题。阿契贝认为，康拉德运用对比的方式，将英国的泰晤士河和非洲的刚果河置于文明的两端，前者是文明的化身，后者是野蛮的代表。尽管“泰晤士河也‘曾是地球上一个黑暗的地方’”，但“它征服了黑暗，如今是一片光明和祥和”。而文中的主人公马洛深入非洲腹地，无疑就暗示着“文明”侵入“野蛮”的中心，面临自身也陷入黑暗深渊的境地。阿契贝认为，康拉德的天才一面表现在用优美的形容词“表达那些难以言传的和深不可测的秘密”，在许多批评家看来，这是康拉德作为一位文体学家的表现，但在阿契贝看来，这是一个事关艺术家道德水准和原则性的问题。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不是仅由其艺术才能决定的，而是由其道德水平和艺术才能双重决定的。“当一个作家假装着描写情景、事件及其影响时，实际上却在他的读者中，用情感词汇和其他的把戏狂轰滥炸以混淆读者视线，这比文体学方面的问题更为危险。总的来说，一般的读者都能警觉地看出并能抵制这种不光彩的做法。”<sup>②</sup>

阿契贝指出，康拉德在描写黑人时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刻画这些哑巴蛮人时要保持必要的一致性；二是用他们自己说出的话作为他们有罪的毫不含糊的证据，这不失为明智之举。”<sup>③</sup>康拉德毫无疑问重点采取了第二种方式。正是这种“粗鲁的模糊不清的声音”“相互交换着短促的嘟囔声”成为黑人“落后”和“有罪”身份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人希望黑人具有和保持的本来面目和形象。黑人即便能够开口说流利的英语，

① 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9, No. 1, Special Issue on Literary Criticism (Spring, 1978), p. 2.

② 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9, No. 1, Special Issue on Literary Criticism (Spring, 1978), pp. 3-4.

③ [英] 巴特·吉尔伯特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杨乃乔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86页。

那也是西方文明教化的结果。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不惜用大量笔墨描述黑人这种不能开口说话的模糊性：嚎叫、嘟囔、鼓掌、支支吾吾等，而偶尔学会欧洲文明的那个学会烧蒸汽锅炉的黑人，则是滑稽得像一条狗，即便如此，这种像狗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不得不说，康拉德的种族意识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查尔斯·拉森在《非洲小说的兴起》中提出了小说的普遍性问题，认为普遍性就是绝少提到非洲。在阿契贝看来，“西方作者的作品总是自动地赋予普遍性。而其他他人，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这种普遍性”。<sup>①</sup>阿契贝希望这种所谓的“普遍性”不要成为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代名词，而是真正体现一种包容的世界胸怀。殖民主义者总是通过诋毁殖民地人民缺乏责任感、道德低下，来为他们文明的优越提供说服力。归根结底，这种包含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殖民主义作辩护的，殖民主义在历史上做出了并不光彩的事迹，而为这种侵略的本质谋求正义幌子的正是种族主义的面具。在殖民者看来，“当你谈论一个民族的发展水平时，你就可以确定他们的全部发展状况，并为他们在人类的进化阶梯上找到一个无可争议的明确位置。换句话说，你就有权力去解释他们全部的物质和精神生活”。<sup>②</sup>落后的社会生产现状，为殖民者认定殖民地人民的艺术水平提供了评判依据和准则，因此，基督教文明者认为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这种“野蛮”和“落后”的文明。殖民者不喜欢太认真、“郑重其事”的人，而是喜欢俯首帖耳的殖民地顺民，像阿契贝这样的作家，是殖民者全力打压和批判的对象。阿契贝认为，作家应该有改变这个世界的认识能力和勇气，应该像民族斗士和战士一样战斗，要表现出某种攻击性的“郑重其事”，艺术家有责任通过艺术去改变人们周围的环境。小说并不是西方特有的样式和特权，对于阿契贝这样的作家而言，改变被殖民者的形象和历史命运正是小说家的使命和责任。

西方殖民者炮制的种族主义故事和普遍性神话，无疑歪曲了非洲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如何呈现一个真实和客观的非洲？文学的政治性，需要靠故事来包裹。对殖民者而言，他们需要故事去为殖民事业辩护；

① Chinua Achebe, *Home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0, p. 76.

② Chinua Achebe, *Home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0, p. 83.

而对非洲人而言，他们需要故事去平衡和改变。<sup>①</sup>“如果狮子没有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那么关于捕猎的故事仍然光荣地属于猎手。”<sup>②</sup>

非洲之于阿契贝，不仅在于它是自己的母体，更在于他把非洲当作自己发声的有力武器。他改变了由欧洲人来定义和描写非洲的现实，而是主张由非洲人自己来书写。同样是描写非洲，何以非洲人描写的非洲更为真实可信？比之有良知的欧洲人书写的非洲，非洲人书写的非洲更为可信的依据何在？追问涉及视角的转变，问题存在两个方面：欧洲人有意书写邪恶的非洲，这是他们的文化偏见和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即便是拥有渊博的非洲知识储备和良好的平等道德观，也仍然避免不了他们书写非洲的文化无意识歧视。正如康拉德这样的代表，在描写非洲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廉价的人道主义情怀”（阿契贝语）和虚假慈悲，这正是由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无意识集体心理所决定的。即便是饱含了同情和怜悯，帝国中心主义话语的整体架构也不允许他们发出异样的声音。“欧洲的人道主义信念同时又包含了反人道主义因素”，<sup>③</sup>“欧洲的文明同时也是一种野蛮”。<sup>④</sup>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指出，西方的“人本主义是适用于所有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但事实上又是极端的欧洲自我中心主义”。<sup>⑤</sup>产生于西方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正是这一反人道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最极端表现。因此，真实的非洲最好由非洲人来书写。

钦维祖等在《通向去殖民化的非洲文学》中指出：“非洲批评家必须发展一套非洲美学，了解非洲传统，并担当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来引导非洲文化价值的转型。”<sup>⑥</sup>阿契贝也提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故事，应该取决于有助于提升普遍对话的人民的的那些迄今为止不是模仿而是未被讲

① 阿契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故事对文本的改变，重写故事的冲动，这不是我，不是非洲人。见 Chinua Achebe and Kay Bonetti, “An Interview with Chinua Achebe”, *The Missouri Review*, Vol. 12, No. 1, 1989, p. 71。

② Chinua Achebe, *Home and Exile*,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2001, p. 73.

③ 张宽：《再谈萨伊德》，《读书》1994年第10期，第12页。

④ 源于本雅明语，他认为人类任何文明的行为都同时是一种野蛮的表现，这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和帝国主义文明的腐朽一面和霸权行为的深刻描述。

⑤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6页。

⑥ Chinweizu, Onwuchekwa Jemie and Ihechukwu Madubuike, *Toward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Vol. 1, African Fiction and Poetry and Their Critics*, Enugu: The Four Dimens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 152.

述的故事,应该用新的方式进行讲述。”<sup>①</sup>“你不能平衡一件事;但你能平衡一件事的多样性。多样性是引发鲜活的事件走向革命的发动机,包括鲜活的文明也一样。”<sup>②</sup> 这里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文学,它不仅承载着实用的政治用途,而且还有着修复历史记忆的心理功能。文学有修复人心的力量,故事是人们拥有通行证的起点,非洲人正是靠非洲人的书写才拥有了做人的资本。事实上,阿契贝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观点:文学不仅可以修复人性,更可以改变世界。

阿契贝的非洲书写是一种人性书写,他从非洲内部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故事的主角是英雄人物,而不是傀儡,比如奥贡喀沃和伊祖鲁分别作为部落的英雄勇士和大祭司。其次,黑人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喜怒哀乐,不是无动于衷的动物式存在。最后,黑人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人类生活特征。比如各种节日庆典和婚丧仪式表演。人们热爱音乐和舞蹈,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举行各种宗教祭祀仪式,用巫术来治病救人。人们吃柯拉果和木薯粥、糊糊,喝棕榈酒,用玛瑙贝求婚。这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并不是西方人笔下野蛮无知的社会。阿契贝的非洲书写还体现了一种反种族主义的共同人性追求。“伊博人崇尚二重性而非单一性。一件物体的存在,必有其他事物伴其左右。”<sup>③</sup> 这种客观的距离感和自由开放的文化思想决定了阿契贝对人性的看法是辩证的,而不是本质主义式的。非洲班图人有一句格言:“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他人(Umuntu ngumuntu ngabantu)。”在他看来,“我们的人性有赖于我们所有人的人性。没有人或者群体可以独自为人。我们只有作为整体时才会优于其他动物,否则就会截然相反”。<sup>④</sup> 这种普遍人性的思考,使他能够克服本质主义的思维。

在阿契贝一系列的创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探索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线索:从奥贡喀沃和伊祖鲁死守民族传统到奥比试图融合西方传统与民族传统再到比阿特丽斯立足人民的多元融合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在某种层面上象征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其最为

① Chinua Achebe, *Home and Exile*,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2001, p. 83.

② Chinua Achebe, *Home and Exile*,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2001, p. 97.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pp. 5-6.

④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p. 166.

成熟的一部小说《荒原蚁丘》中，他描述了精英知识分子企图抛弃大众，与传统一刀两断，卡根政府企图完全西化，斩断与过去的联系，这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对腐败和权力的追逐，麻痹了部分非洲知识精英的双眼，使他们寸步难行。但作者对未来理想的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仍然持有希望，希望就在于人民和团体的力量。而人民的觉醒为其首要，关键在于人民能够展示说“不”的勇气。在《人民公仆》《荒原蚁丘》中属于人民的权利空间已然被践踏无虞。在殖民前的非洲集体中，他们通过公共讨论来议事，亦解决纷争。但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管理制度，显然破坏了非洲人的公共协商领域。公共空间的消失，意味着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和民主氛围的消失，随之泛滥的则是极权、对金钱的疯狂追求、无止境的欲望和混乱。上述小说正描绘了这样一个非洲人公共领域被破坏后，主人公道德价值沦丧，攫取权力的贪婪导致的混乱不堪局面。南加部长口是心非，玩弄权谋，最终亦被权谋所谋；奥迪里在经历一系列挫折打击后道德价值观彻底扭曲，最终沦为共同的“吃者”；萨姆排除了公共领域，最后被公众所厌恶和唾弃；克里斯和伊肯以死告诫精英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危险。而在比阿特丽斯为小孩命名的仪式上，阿契贝提出了非洲各个阶级大联合与和解的宏愿。

## 二 语言政治批评

语言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后殖民的抵抗，任务在于辨识语言之中包含的殖民中心主义，殖民话语是一种“认知暴力”。<sup>①</sup>一种语言与另外一种语言的杂交不仅使源语言得到了生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目标语的表达。英语与非洲语言的杂交正体现了这一点。在殖民话语的矛盾处，打开了杂交话语的“第三空间”，杂交的成功有赖于杂交语言双方的权力和地位。语言的杂交，同时也是文化的杂交与交锋。跨文化的“翻译”正是在语言的杂交中形成并成为抵抗殖民语言的有力武器。

语言并不是僵化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语言具有鲜明的意

<sup>①</sup>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2008, pp. 243 – 261.

识形态性,后殖民话语体现了一种“认知暴力”。法依指出:“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sup>①</sup>人无法外在于语言进行思考,语言的交流,其实是思想的交流。那么,在语言的传达中,人们如何达到对思想的深刻认识?换句话说,殖民者在非洲的殖民语言,比如英语,被殖民者又如何去辨析自己用英语创作的作品中语言所内含的殖民思想呢?对于那些一眼望去赤裸裸的殖民语言,被殖民者是很容易觉察的。但对于隐藏于语言外衣下的殖民思想,又如何去发觉?因为“语言在任何情况下不仅仅传达可以传达的事物,同时也是不可传达的事物的象征”。<sup>②</sup>因此,除了看清语言表层的意涵之外,被殖民者更应该探索那语言之下的潜意义。研究表明,语言的运用是有历史的。词语的组合仅仅把一些表面的字意留给了人们,而更多的是在语言之外。语言之内的意义是字面的显现,而语言之外的意义则与人的历史实践密切相关,它需要我们透过语言的表层,进入语言的内部去深入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说,发现殖民话语之下的无意识才是被殖民者更值得去做的工作,那才是殖民者的本质和真实欲望,它们就隐藏在语言之中,借助语言的修饰和话语的掩盖,伪装成“善”的形式,以“救世主”和人道主义的关怀来俯视殖民地,而被殖民者却一无所知。真正敏锐的被殖民知识分子就是要揭穿这种语言之下的谎言和殖民者虚伪的本质以及他们借语言的幌子向殖民地抛过来的无声的殖民思想。

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殖民话语的这套把戏可以形容为语言的“认知暴力”,它是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sup>③</sup>“认知暴力”采取使殖民地人民消声的文化策略,从而使被殖民主体依附于殖民主体;同时,它也披上文明的外衣,为殖民入侵的事实提供合法化的依据。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斯皮瓦克仔细分析了康德的启蒙哲学,在她看来,康德的文化概念将人分为“文明人”和“粗陋的人”,“粗陋的人”必须接受“文明人”的文化纠正,但这是一场没有完结的工作。“尽管帝国主义的

① [法] 弗朗兹·法依:《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25页。

② [德]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290页。

③ 李应志:《认知暴力》,《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9期,第60页。

文化任务永远也不会真正成功完成，但仍必须着手去做。”<sup>①</sup> 这是基于康德对“崇高”的分析而得出的文化纠正。康德认为崇高不是产生自文化，而是基于人性的生产。而文化鄙陋的人自然应该接受文化纠正，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崇高感。不仅如此，康德还将人的目的性由善扩展到上帝，由此，从欲望到道德，从道德到宗教，人完善了自己，发展了自己，人的目的最终达成，这一切都通过善的意志来实施。<sup>②</sup> 这种“自明性公理”的产生是以排斥他者文明为代价的，最为关键的是这种道德律令使得西方人拥有了驯化非西方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他们认为的“野蛮人”首先变成人，才能使其所谓的教化“野蛮人”成为自己的目的和使命。可以看到，西方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崇高道德感，是与康德的贡献分不开的。殖民话语更是冠冕堂皇，形形色色的殖民者打着文明的旗帜，以救世主的姿态加入殖民入侵的队伍中来，为他们所谓的拯救实质上却干着侵略和剥削的勾当充当一种理由充分的知识上的辩护。斯皮瓦克的分析是独到而深刻的，她把西方自启蒙思想以来的思想做了认真的辨析，这种宏大的启蒙话语实质上是一种包含了排斥非西方文明的帝国中心主义话语，“从认识论的深层揭示了那种自明性公理潜在的殖民主义逻辑，指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霸权’的和话语场的渗透力量所在”。<sup>③</sup> 正是基于殖民话语的虚伪本质，阿契贝创造性地运用了属于非洲部落的特殊语言和词语，在这种语言的转换中，非洲的不可言说变成了可言说。他运用英语创作小说，这是一种无奈的事实选择，但同时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即表面的殖民思想被殖民者可以清除，但更多的无意识殖民欲望却不能根除），那么它就不能完全地传达非洲的经验。非洲的某些特殊情感和经历必须要通过非洲人自己的特殊表达才能有意义和价值。

阿契贝选择用英语来创作，并非仅仅出于英语的通用性，而是由历史和现实决定的。在阿契贝看来，英语与非洲本土语言，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两者皆可”。“只要尼日利亚想要作为一个独立国

① [印度]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严蓓雯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 [印度]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严蓓雯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17页。

③ 李应志：《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96页。

家而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除了用一门外来语言,即英语,将国内二百多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别无选择。”<sup>①</sup>讲不同语言的人要实现文化上的理解,唯有靠统一的语言,一种通行和共同使用的语言。“殖民主义在非洲打乱了很多事情,但它确实创建了一个大的政治实体,而这个实体曾经是许多个分散的个体。”<sup>②</sup>在尼日利亚,正是英语实现了这种沟通的目的。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后,英语的流通成为克服语言交流障碍的首要因素。与非洲其他地区同样有着无文字历史的尼日利亚在语言和民族上的混杂,使它不得不接受英语。

在非洲本土,语言的运用还牵涉关于“非洲文学”的定义。在部分人看来,用欧洲语言创作的关于非洲的文学并不是非洲文学,它只能是欧洲文学。这些崇尚本土主义的作家有瓦里、恩古吉、钦维祖等。但在阿契贝看来,“这太教条,证明这些欧洲语言在今天的非洲被书写,这是因为这些语言在非洲被口头运用”。<sup>③</sup>民族文学有着现实的土壤,它不仅在国家内通用,而且有着一定的读者群。“真正的文学是用民族语言写成的。少数民族文学仅仅在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族群内部流传。”<sup>④</sup>因而,英语写作是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而用豪萨、伊博、约鲁巴等语言写作则是少数民族文学(ethnic literature)。但他同时也认为“发展非洲文学要使用非洲语言。这不是一个或另一个选择,而是两者皆可”。<sup>⑤</sup>“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非洲人是否能够用英语创作,而在于他们是否应该用英语去创作。”<sup>⑥</sup>也即是说,英语在非洲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那么,英语能够成为非洲作家描写非洲的有效工具吗?阿契贝指出,“我认为英语能够承载我非洲经验的重量。但是,它必须是一种新的英语,它完全可以用起始于它的母国的英语进行交流,但必须改变以适应新的非洲环境”。<sup>⑦</sup>

①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非洲的污名》,张春美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第112页。

②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18 (1965), p. 28.

③ Chinua Achebe and Kay Bonetti, “An Interview with Chinua Achebe”, *The Missouri Review*, Vol. 12, No. 1, 1989, p. 74.

④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18 (1965), p. 27.

⑤ Chinua Achebe and Kay Bonetti, “An Interview with Chinua Achebe”, *The Missouri Review*, Vol. 12, No. 1, 1989, p. 74.

⑥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18 (1965), p. 30.

⑦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18 (1965), p. 30.

阿契贝对英语的运用并非照搬与复制，而是进行策略性改写，使之包容非洲人特有的语汇、意涵。“世界语言的代价是屈服于不同种类的使用。非洲作家使用英语的目的在于不改变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的价值而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sup>①</sup> 语言是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抵抗的有力武器。这是语言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辩证思维体现。那么，如何剔除英语殖民主义中的暴力认知与殖民思想呢？

后殖民理论大家霍米·巴巴认为，殖民话语并不纯粹，它本身是由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构成的。因此，作为殖民主体的英语话语，并不稳固，它是混杂式的存在。而二者的接触，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翻译与交锋。在殖民话语的模糊处为被殖民者打开了一个“第三空间”。语言的杂交意味着跨文化“翻译”的形成，阿契贝正是通过杂交的语言达到了抵抗帝国语言和叙事的目的。“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间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分裂的主体。”<sup>②</sup> 这种“间隙性空间”就是“第三空间”，这种跨语言所带来的跨文化杂交的场域为巴巴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在此空间里，巴巴看到了被殖民者反抗的可能性。巴巴以为，“第三空间”的发现，使被殖民地人民看到了希望，他们不再迷恋殖民话语的霸权和权威，而是通过杂交话语的运用，颠覆这种单一的权威话语，发出属于被殖民者自己的声音。

阿契贝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它把你想到的和听到的翻译成一种语言。但有些东西，是不能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比如，伊博人的守护神“吃”（chi），它是没法用英语来传达它的深意的，因此，有必要保留一种本原的状态，直接用“chi”来代替英语的翻译，这样不至于损失民族特有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改写，注重了非洲的特性和个性化的声音。传达的是直接来自非洲内部的声音，通过阿契贝的进一步解释，人们得以了解这个词所反映的深层民族内涵和它全部的文化意义。其他词还有如“奥比”（Obi）<sup>③</sup>、“奥苏”（Osu）<sup>④</sup> 等，

①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18 (1965), p. 30.

② 转引自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0页。

③ “奥比”（Obi）指非洲特有的一种小屋，这里阿契贝采用了直接英译法，以突出非洲特色。

④ “奥苏”（Osu）是指非洲部落选中的献身给神的人，以前实行活人祭，现在因血腥废除人祭，但被选的家族仍然被认为是不洁的，尤其是女性，不能婚嫁。

在小说中都有体现。改写后的语言能够形象地传达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经验,从而实现对被殖民者身份的定位。当阿契贝把非洲文化中特有的词语运用于英语中时,一种解构帝国语言的政治策略就呈现于人们面前,实现了用“小写英语”颠覆和改写“大写英语”的目的。

阿契贝采取的措施就是用非洲的本土特有的语汇来替换无法用英语表述的词语,或者说使用英语无法完全理解这种特有的属于非洲本土的现象。译者把语言从一种文化空间带入另一种文化空间,源语言在目标语言空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所传达的信息却不是对等的,“原文在译文中得以存活,是因为翻译的行为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他性,使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同时也改变着他者文化的历史命运”。<sup>①</sup>也就是说,当阿契贝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传统在交锋。“语言之间的交易总是民族和国际斗争的一个交锋场所。”<sup>②</sup>阿契贝用意明显的这种文化翻译策略,在于使被压制、沉默的非洲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英语不能发声或不能完全发声的地方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人们把非洲呈现为原文本,自然用英语创作的语言就属于译文。用英语来翻译非洲的本土经验,这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较量,更是两种文化的较量,而关键在于非洲经验在英语传达中的激活与变形,既有有益于传播的一面,但同时也失去了非洲经验的本来面目。而经过阿契贝的策略性改写,比如插入非洲本土专有词语、习语、谚语、寓言故事等,来弥补这种文化翻译中的失落的一部分。由此,不仅英语的普遍经验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余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非洲本土经验在这种语言转换和文化互动中得到了改变历史命运的机会。这是两种语言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双赢局面,也应和了本雅明在破碎的后现代社会实现弥合其语言衰落的救赎之道。

但要注意的是,在不明确杂交的主体、杂交的对象,谁掌握着杂交话语权等问题时,就可能陷入帝国主义的维护者有意构织的意识形态圈套中。在已然不平等的交往中,帝国主义的维护者正好对杂交性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杂交的话语权,利益已经向他们倾斜,无论你采取何种话语方式,都是由他们在操纵着游戏规则。所以,在杂交之前,必须先搞清楚杂交的主体是谁。贸然提倡杂交,不是对事实视

① 陈永国:《理论的逃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97页。

②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33页。

而不见，就是一种过于无知的幼稚态度。一味坚持混杂性，可能对意识形态掩盖下的权力差异视而不见。此外，对话语的辨析和语言的认知并不等于在事实上能清除非洲的殖民历史与新殖民现实，除了文化上的清醒认知与警惕外，非洲社会能够得到切实救赎和改变的只能是从政治、经济上掌握自身的主动权，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和受制于人。因此，由语言而引发的话语分析并不能彻底解决非洲的发展和现实问题，其夸大式的分析只能令非洲走向死胡同，这是要辩证看待的。

### 三 文化政治批评

认同 (identity) 又可以指身份或同一性，表示“我是谁”或“我们是谁”，也即个人或集体的文化归属感。不管是个人的文化归属，还是集体的文化归属，都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文化认同总是与民族认同结合在一起，它指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sup>①</sup> 对非洲而言，文化认同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内部常常种族、宗教与语言异常多样混杂，整个非洲大陆情况大多如此。历史上非洲的有识之士为寻找非洲的文化认同而殚精竭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布莱登提倡的“非洲个性”<sup>②</sup>、杜波依斯的“泛非主义”<sup>③</sup>、桑戈尔的“黑人精神”<sup>④</sup>等，最终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使得非洲从独而不立的被动状态中开始真正走向民族自决，从而民族国家得到发展。这其中，黑人文化认同的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非洲大陆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有的部落之间的差异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但由于黑人集体文化的认同感，使得非洲民族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推翻殖民统治，朝着民族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发展。

- 
- ① 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29页。
- 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非洲学者黑人布莱登提出，认为全体黑人有自身的同一性和共同一致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和成就，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 ③ 指黑人的民族主义，核心内容为争取非洲的独立和统一。它的出现是黑人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
- ④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产物，在文化上反对“同化”，主张发扬传统黑人文明精神；在政治上反对殖民统治，主张独立和统一。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根基, 丢弃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 一个统一的国民或民族文化对非洲的发展至为关键, 这也是非洲社会发展至今坎坷重重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①</sup>

阿契贝对民族传统作了不懈探索, 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人物对传统文化的不同追求。西方的殖民入侵, 已经表明了民族传统不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 而是必须要与时俱进, 才能获得发展的方向。阿契贝作品中的奥贡喀沃和伊祖鲁的悲剧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但是, 他们眼中的传统与伊博人所尊奉的变化传统又是相背离的, 这体现了阿契贝的一种辩证态度。“伊博人的竞争性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对尼日利亚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是必需的”, “尼日利亚缺少了伊博人的创新和活力, 希望将变得更渺茫”。<sup>②</sup>

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 抛弃民族的传统, 不可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倡导多元文化观, 既是消解中心、解构权威的时代, 也是易陷入混杂不堪的多元式的一元观圈套的时代。也即是说, 在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解构一切的基础上, 民族的信仰消失了, 民族的历史感虚无化了, 民族发展所应当遵循的传统合理性瓦解了。面对这种表面上多元, 其实是多元化的一元的实质, 人们应有理智的警醒。当今西方人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就其本质上就是西方化、欧美化, 他们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跨国资本, 就是要摧毁民族国家的自信心和传统文化, 以实现他们在新时代的又一轮的殖民统治和霸权政治。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需要的是争取生存的权利, 这在早已摆脱发展困扰, 走向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后现代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在考虑之内的, 他们需要的是全世界遵循自己节奏的律动。这种由发展位差导致的思想文化差异不仅显示了西方人的无知、盲视, 更揭露了他们在全球化时代谋求霸权继续合理化的曲折表征。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中的奥比在打着文明多元和文明普遍主义幌子的西方文明的腐蚀下, 最终走向灵魂无所依凭, 成为“空心人”。在此, 文化融合的观点成为阿契贝自然的选择, 这种选择既是历史的必然, 同时也与作家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他从小体验到了两种文化(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的交叉: 生活在文化的十字

① 刘鸿武:《非洲文化与当代发展》, 人民出版社, 2014, 第32—37页。

② Chinua Achebe, *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Enugu: The Four Dimens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 62.

路口上，却并不感到灵魂的撕裂感。这种有距离的观察，让他对两种文明都有着清晰理性的认知。而他从小生活的伊博族群，是一个遵循永恒变化为生活准则的部落，这种辩证的思维观为他提供了很好地处理传统（非洲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的能力。最终，阿契贝从非洲人民那里找到了非洲文化发展的动力。

阿契贝曾明确地指出：“我的艺术和知识遗产部分地来源于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使艺术家有可能创造出他足够稳固的艺术对象，然而艺术家不试图声称，甚至有时会竭力否认，个人拥有他们所创造的一切。”<sup>①</sup>这就深刻地说明了一个作家与他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在他的小说中，不仅古老的非洲神话、谚语、诗歌等民间口头文学缓缓流泻，而且还对非洲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和出路作了深入地揭露与探寻。非洲伊博人的世界观体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多元开放的传统，而这种观念正体现了传统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运动的辩证过程。《瓦解》中的奥贡喀沃和《神箭》中的伊祖鲁作为伊博传统的背离者，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狭隘理解和个人的权势欲望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非洲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必须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达致一种新的文化平衡，才不至于造成文化的震荡。非洲人必须重新回到这个新的传统，只有在新的非洲传统文化中，才能找到发展的路向：那就是立足传统文化，融合西方文明，创立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的尼日利亚文明，又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具有独立特色的新的民族文明。

阿契贝这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思想和客观理性的辩证态度，人们可以将之称为一种“中间”文化观。他认为：

前面的人会看到鬼怪，  
中间的人是漂亮的幸运儿，  
后面的人会弄伤手指。<sup>②</sup>

这样能够“避免盲信一条道路、一个真理和一种生活方式”。“中间立场既非事物之始，亦非事物之末；它明了可以投奔的未来和能够依靠

<sup>①</sup> Chinua Achebe, *Home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0, p. 48.

<sup>②</sup>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2009, p. 5.

的过去……”<sup>①</sup>阿契贝曾在与拜尔顿·杰伊夫(Biodun Jeyifo)的对话中说:“但你明白,文化是曲折发展和易变的,因为不如此,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文化对你说必须强势,必须这样那样,一旦这种绝对强势的文化对你这样说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做,要把持住自己!’……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在他强势的同时马上就会体现充满爱、充满温柔的女性化的一面……”<sup>②</sup>《瓦解》中奥贡喀沃的毁灭和《神箭》中伊祖鲁的发疯正是由于他们坚持文化的强势一面,不肯妥协和变通而造成的,这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不仅人物命运有着鲜明的辩证思维,而且在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也体现了阿契贝的双重观念。小说《瓦解》作为主观动机上的反殖民书写,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全部否定和反对,其客观上的内部透视也并非一味为民族唱赞歌。对于西方殖民文化,阿契贝认为:“一定有收获——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过的收获。我不是那些愿意说非洲在殖民年代根本什么也没得到的人中的一个,我的意思是这种说法太荒谬了——我们曾经得到很多。”<sup>③</sup>而对于传统文化,他认为:“我们不能自认为民族的过去是一首长长的、色彩明丽的田园诗,必须承认像其他民族的过去一样,我们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sup>④</sup>“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看待事情的简单方式……邪恶不总是邪恶,善良从另一方面也会被自私浸染。”<sup>⑤</sup>

阿契贝的包容辩证还在于他智慧地选择了殖民语言,这一点上述有论析,兹不赘述。阿契贝始终站在一个双重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文化。阿契贝的这一“中间”文化观是伊博人偏重二重性的文化传统、非洲万物有灵的宗教传统和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文明共同造成的。他从小生长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族群中,伊博人视变化为传统,其灵动辩证的思维深深烙印在作者身上。阿契贝成长于一个双重文化交织的家庭环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2009, pp. 5-6.

② Bernth Lindfors ed., *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 Stark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7, p. 118.

③ Dennis Duerden ed., *African Writers Talking*, Oxford: Heinemann, 1979, p. 13.

④ 俞灏东、杨秀琴、刘清河:《现代非洲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第18页。

⑤ Rose Ure Mezu, *Chinua Achebe: The Man and His Works*, London: Adonis & Abbey Publishers Ltd., 2006, p. 229.

境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他的叔叔以及周围的环境都赋予他一种非洲传统宗教的亲切感。阿契贝并没有因两种不同的宗教而产生分裂感，而是很好地将两种宗教情感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双重文化交织的生活情状阿契贝形象地比喻为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危险是因为一个人可能陷入各种各样思想的纠缠中，但同时它可能是幸运的并带着福音般的先见之明回归人民”。这种文化距离感又使他获得了一份清醒的理性思考，因为“这个距离不会导致分离，而是会使双方结合，这就像退后一点的位置对于一个明智的观察者为了从容地、充分地欣赏一幅油画所占的位置一样”。<sup>①</sup> 传统的冶炼与家庭的熏陶共同铸就了一个包容而智慧的阿契贝，在他文本中所投射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观。

从地域和文化政治属性（第三世界）上，非洲文化传统无疑属于东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东方文明的多元性也蕴含着一种统一性。河流文明赋予的农耕性质和基于血缘关系的人际纽带构成东方社会的基础，马克思形象地将之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奠基其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因此，东方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样态的一致性决定了在文化上的大体相似性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思维方式的内倾化与直觉化，人际关系的伦理化和等级化，生活方式的克俭无争。<sup>②</sup> 这种统一的“东方精神”<sup>③</sup> 表现在文学上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曲折而多元发展，整体风格的恬静自然，注重描绘主观真实，浓厚的宗教信仰，丰富的民间文学底蕴以及鲜明而悠久的民族特色。<sup>④</sup> 非洲传统正是在统一的东方文化传统中凸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式的宁静与和谐。受“万物有灵”观的普遍影响，非洲人把自然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当作可以接纳的属于最高神的恩赐，这类似于西方基督文化的神恩普照。“自然被看作是上帝的造物，自然本身又是神灵，受到非洲黑人的崇拜。”<sup>⑤</sup> 人们看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2009, pp. 34-35.

② 黎跃进：《东方文学史论》，昆仑出版社，2012，第10—11页。

③ 黎跃进把东方这些大体一致的文化特征概括为“东方精神”，它是“东方文学统一性的文化心理基础，即东方文学的文化潜质”。参见黎跃进《东方文学史论》，昆仑出版社，2012，第11页。

④ 参见何乃英《东方文学概论》（修订本），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第44—77页；黎跃进：《东方文学史论》，昆仑出版社，2012，第11—16页。

⑤ 艾周昌、舒运国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200页。

到,阿契贝文本中所体现的一种中间思维其实就脱胎于这种包容而智慧的非洲传统与东方文明传统。

中间性哲思赋予阿契贝一种清晰客观的理性,避免了因历史伤害而产生的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陷入萨特所说的“一种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sup>①</sup>的二元对立思维中。非洲人要做的不仅仅是回忆痛苦,更要“履行奉献之责,把谴责留在神灵的门槛上”。<sup>②</sup>“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sup>③</sup>阿契贝正是将非洲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置于中间的视角,直面现实,分析不同文化的优缺点,充分展示了他充满活力的辩证文化观。阿契贝的“中间”思维和文化思想促进了对西方文明普遍性的质疑与对人性共通性的思考,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和谐共生,对于提高东方文明的重要地位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 四 结语

萨特曾说:“如果文学不要求一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sup>④</sup>奥威尔认为,一个作家“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sup>⑤</sup>由此可见,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就是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政治是内在于文学的。文学的政治性不等于政治,包含政治性的文学也可以表达独特的审美理想而蕴含审美性。对于非洲文学而言,文学与政治须臾不可分离,这一点尤其重要。

阿契贝关于文学的种族政治批评、语言政治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

- 
- ① [美] 伦纳德·S. 克莱因主编《20世纪非洲文学》,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第154页。
  -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2009, p. 164.
  - ③ 邹广文:《中性思维、和谐社会与哲学的创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4页。
  - ④ [法] 让-保尔·萨特:《萨特自述》,黄忠晶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第169页。
  - ⑤ [英]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415页。

从种族、语言和文化视角批驳了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简而言之，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批驳。其“中间”思维和文化思想启发了文化的和谐共生，有助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

【责任编辑】 杨惠

serious brain drain, diseases, terrorism threat and etc.. Therefore, Nigerian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increase the number and the sca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s, and perfect the interschola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in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and further encourage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renaissance in local region, and then ensure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Keywords:** Nigeria;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 Discussion of Achebe's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Thought

*Qin Pengju / 175*

**Abstract:**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s, which is a way of literary existe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belong to ideology, but literature takes “aesthetic dimension” to counter the falsehood and cruelty of ideology. For African literature,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literature can not be separated for a moment, which is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y and re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chebe's racial political criticism, language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political criticism about literature, and refutes the western ethnocentrism, language centrism and cultural cent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Achebe's “Middle” cultural thought inspired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cultur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qual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ultures.

**Keywords:** Achebe; Political Criticism; Middle Culture

### Cultural Identity of Ahmadou Kourouma—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Allah n'est pas obligé*

*Yu Peilin / 194*

**Abstract:** Cultural identi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African contemporary writers. The Ivorian writer Ahmadou Kourou-